

您的位置：比较政治研究网>理论探索

论现代国家的政治分类

作者：袁峰 来源：《比较政治学研究第二辑》，2011年9月，中央编译出版社

来源：《比较政治学研究第二辑》，2011年9月，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简介：袁峰，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上海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

内容提要：如何对现代国家进行政治分类？这在当今比较政治学界是一个存在着意见纷争的研究领域。西方比较政治学者在有关比较政治研究的路径、分析工具以及价值标准等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些代表性的观点。但是，其中一些观点对于进行现代国家正文治分类却存在着局限性。在对现代国家政治分类问题的研究上，应当选择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分析路径、采用基本分析变量与特殊分析变量相结合的分析工具，并要在寻求共性价值的基础上尊重各个国家自身的价值理念和价值选择。

关键词：比较政治学；现代国家；政治分类

比较的政治学，立足于对范围广泛的各类国家的研究，但是研究结论因分析者不同而发生的变化之大日常会超出人们所能接受的程度。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对现代国家政治分类问题进行研究，需要选择正确的研究路径、分析变量以及价值标准。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要比匆忙地得出结论要有意义的多。

—

就以往比较政治学形成的研究路径而言，西方比较政治学家对于如何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形成了两种立场：一种立场的学者，强调的是跨越国家和文化的边界来开展比较分析，他们更有兴趣去研究政治现象中的各种模式是如何在不同国家中显现出来的。持另一种立场的学者，强调任何社会或者政治现象的内涵都要受到该国具体情境的影响，重点研究一个指定国家内部对于各种要素的安排处理，否定跨越国界来对这些现象进行归纳的可行性。[\[1\]](#)笔者认为，前一种立场可能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或一种模式进行比较政治分析，但在脱离各国的情境因素下进行的研究难免使这种分析趋于形式化、表面化；后一种立场强调了要考虑国界内的情境因素，但仅限于国内的研究又难以形成比较政治分析的普遍性的结论。国家政治分类问题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对现代国家政治分类问题的研究中，应该力求使研究路径能够满足上述两项要求，即既要关注各国的情境因素，又要能够跨国界、跨文化地进行比较分析，这样才不会使研究有所偏颇。

对国家进行政治分类，是比较政治学中最古老却又最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正是通过对158个古希腊城邦政制考察的基础上进行分类研究而写成的。目前，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学者对现代国家的分类，形成了两种比较常见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主张按照西方民主的价值标准，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划分为既有民主国家、新兴民主国家和威权主义统治国家三类。既有民主国家是指巩固的民主国家，主要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美国、荷兰、瑞典、挪威、新西兰、日本、印度等。新兴民主国家既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后军人政权，也包括象俄罗斯那样兼具民主与权威特质的政体。威权主义统治国家被定义为“统治者居于法律之上，免于有效的人民问责；媒体受到控制或恐吓；政治参与通常受到限制和压制；但是，统治者的权力经常会因需与土地所有者、实业家和军队的策略联盟而受到约束。”^[ii]另一种观点是主张按照经济的指标将国家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然后分别指出这些国家各自的政治特征。持这种分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大部分位于非洲、亚洲、中亚和拉美的国家都是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不仅处于贫困之中，而且社会政治制度欠发达，实行专制政体的比例很高。中等收入国家分为中低收入国家（包括大量拉美国家、还算富裕的中东、非洲、东欧和东南亚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包括在欧洲的一些穷国，如东欧国家），在政治上体现出转型的特征。高收入国家中既有相对较穷的韩国、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又有来自西欧、北美、英联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更为富裕的国家，这一类中的所有国家几乎都是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iii]

从上述西方学者的国家政治分类来看，第一种分类主要依据的是西方的政治价值标准，从西方民主的价值尺度来衡量所有国家的政治状况，明显地带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也是广大非西方国家所不能接受的。笔者认为，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对国家进行分类，因为不同类型的国家本来就是生存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可以从导源于各自文化传统的文化价值出发来设计和营造本国的政治制度。但是，不能将某一种文化传统看作是居高临下、神圣无比的，更不能以某一种产生于区域性文化环境的政治标准来衡量所有国家的政治状况。第二种国家政治分类主要依据的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提供的经济数据，在不同经济收入阶段的国家与其政治模式之间建立起观察和分析的视角，而且其中对于政治模式的分析同样依据的是西方标准。这种分类的缺陷在于，它不能在所有的国家完全找到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例如，按西方民主标准，印度属于既有民主国家，但它又是低收入国家；同样，新加坡长期以来一直被西方学者视为威权主义统治国家，但它却是高收入国家。在国家政治分类问题上，经济指标是一种可参考的依据，但又不是绝对的。而且，仅仅从经济一个维度来观察国家的整体状况，也是十分不客观、不科学的。笔者认为，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来判断国家的现实类型却是一条可选择的路径，而在对社会发展程度的判断上可以引入经济数据作为支撑，从经济层面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笔者认为，对于现代国家的分类应当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在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基础上形成的各国文化传统，是现代国家政治分类时不可缺少的一个历史坐标。这一坐标满足了现代国家政治分类问题研究路径中所规定的情境要求。决定现代国家类型的因素有许多，但文化传统一定是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一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学者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的。“事实上在1960年之前，早期论述发展的理论家们没有一个在发展中国家里呆过很长时间；他们对发展的看法通常是雾里看花，甚至是很浪漫的，根本没有看到第三世界残酷的政治现实。其次，他们使用的模型来自美国与西欧的经验，对那些拥有不同历史、文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几乎不具备什么价值。这就导致了第三种主要的解释：他们忽略了关键的政治、文化与宗教变量，只是简单地假设，一旦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开始发挥作用，那么所有国家的社会结果与政治结果都将是一样的。但是，发展当然没有按照这种方式实现，而且这么想问题也是错误的，并带有误导性。事实上，文化一直是发展的过滤器，是阻挡某些西方思想入侵、而让另一些西方思想进入的因素，还是一种迫使发展适应当地条件或导致失败以及不曾预期的结果的因素。发展理论对这些因素的忽略使整个模型与很多专门的项目都注定要面临失败。”^[iv]1987年塞缪尔·P·亨廷顿和韦纳在其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书中，明确指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观点：就解释政治经济

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

世界上不同类型的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是不同的，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也不一致。“作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之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某些方面与合作主义是相似的。即，它并不声称自己是一种包容一切的完整研究方法，但是可以作为其他一些方法的有益补充。同时，它也不像其他的方法那样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与争论性。相反，比较政治学的领域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方法，而不像其他一些更新的方法那样，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方法既强调政治因素，也没有忽视社会与经济因素。”^[v]由于是对现代国家进行分类，所以，只有历史坐标是不够的。因此，有必要从现实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更清晰地把握现代国家的类型，这是对现代国家进行分类时同样不可或缺的现实坐标。这一坐标满足了现代国家政治分类问题研究路径所要求的跨国界、跨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要求。

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将历史坐标与现实坐标的交汇点在现代国家的谱系中标识出来，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出这个国家的类型。

二

就像微生物学家观察细胞时需要借助显微镜、天文学家观察天体离不开望远镜一样，对比较政治领域的观察同样需要选择合适的“工具”。从近年来比较政治学者的研究成果看，比较多的集中于制度层面的比较，以“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政府制度”等为题的作品甚多。这类作品主要涉及本国政治（政府）制度构成要素的介绍、与国外政治（政府）制度的比较等，在一定程度上为比较政治的研究提供了辅垫。尽管我们借助这一分析工具能够比较直观地观察研究对象，但如果单纯以这一工具对现代国家类型进行判断却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首先，特定国家政治制度的产生与形成都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无论它是自生自发于一定的时代、环境之中，还是在特定背景下受外力作用制度移植的结果，制度细节上的微观比较不能取代对宏观视野中时代背景的研究。没有对于时代背景的研究，也就无从解释制度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有关国家类型的研究也就失去了历史感。

其次，国家宪法文本上的制度安排与现实世界里的实际运作有时并非一致，偏差和走样是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从现实去感知政治与从文本上去获知政治是有区别的，两者是不能相互替代的。缺乏现实感的国家类型研究可能只是停留于表面化的描述上。

第三，政治生活必须依赖于人的活动和创造。只有当各种政治角色运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投入政治生活，政治生活的大舞台才可能是绚丽多姿、五光十色的，并在创造性的政治活动中去改造陈旧、落后的政治环境，营造健康、文明的政治环境。政治是一种集体行动，再完美的政治制度设计离开了人们的社会政治实践，也是空中楼阁。任何制度的运行都离不开一定社会结构的支撑。不了解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将难以确认推动或阻碍制度运行的各种社会力量以及它们的发展趋势对未来政治的影响。将社会形态分析纳入到国家类型研究的视野，将会使国家类型研究获得可靠的支撑感。

第四，政治社会的宏观变化最终都要通过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微观变化完成转型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体系，不同的文化要素的排列组合形成了错综的结构形式。从政治文化所包含的内

在要素来分析，政治文化的结构具有多层次性的特征。它可以划分为心理层面（政治认识、政治感情、政治态度等）和价值层面（政治思想、政治理想、政治评价等）。随着现代政治学的发展，众多的政治学者开始从政治制度是政治社会现象中的中心因素的传统观念向承认政治文化在现实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过渡。政治文化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观念和政治现实观念构成的混合体。任何制度的运行都要有适宜的文化土壤。有时制度的变迁与文化的变迁并不总是同步的。简单的制度比较，并不能反映制度与文化的契合性，使国家类型研究缺乏贴切感。

最后，现代政治是一种国际现象。一国政治发展不可能完全割断与其他国家政治的联系。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政治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性特征已经清晰地展示于我们的眼前。国家主权的绝对性、不可侵犯性决定了国家在国家间政治交往和处理各种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必须以国家利益原则为准绳。而政治的世界性特征使国家作为个体成为国际社会整体的一员，国家的外交行为和外交决策都可能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现代国家类型研究不能局限于对国内政治制度的介绍，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观察一国对外政策的特点和倾向将使国家类型研究获得延伸感。

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不同的比较政治学者都有自己观察的工具，并且认为自己的观察工具是最好的。在上述分析中，借助制度这一单纯的观察工具进行现代国家类型研究，往往会忽略一些重要的参考系，而使观察到的对象缺乏历史感、现实感、支撑感、贴切感、延伸感。因此，依靠单一的观察工具是不能全面、清晰、系统地把握国家的全貌的。此外，以制度这一单一分析变量作为分析工具，容易将带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民主制度作为典范来衡量各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程度，陷入到西方的制度决定论的泥潭之中。有些西方政界和学界人士提出西方中心论的主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西方化的“政治模特儿”，结果一些模仿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出版的著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中，以事实说明了一些国家任意模仿西方民主模式之后的恶果。

在对现代国家政治分类问题的研究中，所选择的分析工具，既应当将一国的政治结构及其运行规则作为其中的分析变量，也应当将社会形态、文化传统、经济背景、对外政策等作为分析变量，力求借助包含有多种变量的分析工具，多侧面地来分析和论证我们对于不同类型现代国家在政府与政治领域的基本判断。任何国家的秩序都不是可以由什么人凭空设计和操作的，都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一定的经济、文化、社会背景，并依赖于这样的阶段、环境和条件而存在与运行的。即使是再完美的国家秩序也不可能在任何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运行自如。对于现代国家类型的分析，当然不能局限于制度上的比较与研究，而应当从上述较为广泛的分析变量出发开展总体性研究。

在对不同类型的现代国家进行观察时，除了可以通过上述的一些基本的分析变量（社会形态、文化传统、经济背景、政治结构及其运行规则、对外政策）进行观察外，还需要考虑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选择并设定特殊的分析变量，这些变量是基于这一类型国家的特点而提出的。就如同我们在观察人类自身时，除了观察四肢和五官这些各种族人群共有的特征外，可以结合不同种族人群的各自的突出特点，对毛发、体形、肤色、身高体重、体力量等方面再进行细部观察和测量。例如，中国、新加坡等国家除了在政治结构、社会管理、意识形态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特征后，都是属于亚洲华人社会；自古至今都受到儒家文明的深刻影响；历史上都经历过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并且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了独立与自主。日本、德国（西德）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主导和强制影响下，在政治结构上基本完成了非法西斯化。1947年日本国宪法取代了旧帝国宪法，1949年德国（西德）制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分析这些国家的类型时不能忽略的。

现代国家类型的研究，不仅要有宽广的视角，注重从社会形态、经济背景、文化传统、政治结构及其运行规则、对外政策等变量出发进行分析，而且要重点观察不同类型国家的特殊性，将基本分析变量与特殊分析变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三

在对现代国家进行分类时，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在对现代国家的分类问题上，西方学者在很长时期内主导了话语权。他们的分类标准以及对国家类型的界定，也直接影响到了国内比较政治学者对国家政治分类以及我国国家政治类型的判断。一些国内比较政治学者以回避的态度，专注于制度细节的比较，而忽略了对国家类型的认识。正是由于对现代国家类型疏于研究，致使其在价值判断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带有西方价值观的研究成果的牵引。只有选择客观、公正的价值标准对国家进行分类，然后才能去理解和认识一国在政府与政治领域的状况，去衡量这个国家的政治进步和发展。2005年中国的联合国改革立场文件中明确反对将世界各国划分成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解释这一态度时指出：“有人提出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这样的分类本身是不对的，是不民主的。在民主问题上，各国因为国情不同，历史发展背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和文化及价值观不同，对民主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主张，民主存在不同的形式。同时，各国在民主问题上也有一些具有共性的看法，对共性和有益的东西各国应该相互借鉴。但各国应保持适合本国国情，适合本国发展，适合本国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民主方式，只有这样我们的世界才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也才能体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vi]显然，我国政府不能接受按照西方政治价值标准对我国国家类型的政治判断，强调在民主问题上的共性标准与个性标准。因此，在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国家进行分类时，有两项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项原则：不能以单一价值标准来衡量所有国家，尤其是不能用产生于某一区域性文明的价值观念对不同类型的国家简单地进行“是”或者“非”的两分法判断。因为，不同类型的国家与其特定的文明背景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能脱离一定的文化背景对现代国家的类型和特征进行评判。

东亚国家以及亚洲华人圈在历史上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就儒家文化对这些国家在政治层面上的影响而言，主要有以下特征，而这些特征对于国家类型的判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强调对统治者的道德伦理要求，树立道德榜样，强调民众对权威的服从。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vii]“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viii]“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ix]。这些都是儒家伦理政治的传统格言。

2. 看重秩序、稳定、纪律在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方面的作用，强调国家与社会利益的至上性，而相对忽视个人及其个人价值，主张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限制个人权利是合理的。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x]“上好礼，则民易使也”^[xi]。新加坡的巡回大使许通美认为，“东亚人并不相信西方采用的绝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我们同意每个人都是重要的。然而他或她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一个核心的或大的家庭、家族、邻里、团体、民族和国家的一份子。东亚人认为无论你做什么或说什么，都必须想到别人的利益。不像西方社会，个人的利益高于所有他人的利益。”^[xii]

3. 主张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由儒教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所构成，它强调能力主义、尊重知识等内容。荀子说：“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必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难乎！”^[xiii]

4. 主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家长式的政府”。主张政府积极而又强有力的介入社会生活，与自由、放任的价值观相对立。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xiv\]](#)李泽厚先生用现代汉语将孔子这句话译为：“爱他们，能够不加以勉励吗？忠于他们，能够不进行教导吗？”[\[xv\]](#)在这里孔子讲的既可以是家长、老师对儿女、学生的关系，也可以是政府对老百姓的一种关系。

5. 宣扬实用理性的思想。西方人的思维特点源于古希腊哲学，希腊哲学习惯从各种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带有普遍性、本质性的理念或标准，并以此来衡量和规范具体。儒家并不拘泥于固定的概念或标准，即探究事情究竟是什么？而是重视事物的存在形态，即怎样去做的实用理性。因此，对待事物的态度既不是盲目排斥，也不是盲目倾羨，而是根据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以正当合理的标准进行取舍。孔子说：“君于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xvi\]](#)。孔子还讲过：“过，则勿惮改。”[\[xvii\]](#)“过而不改，是谓过矣。”[\[xviii\]](#)“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xix\]](#)这些都是儒家实用理性的名言，反映了儒学的宽容精神。

美国圣母大学政府与国际研究系专门研究东亚政治的小彼得·J·穆迪教授认为：“在东亚地区，与政治最密切相关的结构是自主国家。这一概念在这里并不仅仅指国家的运作独立于社会的压力，而是指国家塑造着社会的秩序。”[\[xx\]](#)“我倾向于把这种国家自主（当然，不是国家实力）看做是东亚的文化特性。”“在关于‘亚洲价值’的讨论中，常常将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亚洲的集体主义做对比，并把这一对比中包含的真实内容简单化。东亚的社会压力对于反对某种个人主义特征——如果不是‘西方’整体的，至少也是美国的——起了作用。”[\[xxi\]](#)小彼得·J·穆迪教授认为：“东亚的个案提供了一个替代主流现代化范式的模式，一个反映了真正的人类成就和不可以完全被轻视的价值观的另类。”[\[xxii\]](#)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将现代西方文明视为基督教文明，认为是从基督教的“蛹体”中孵化而生的。“自从我们的西方基督教社会在一千二百年以前从教会的母体里呱呱坠地以来，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一直是受它的养育哺乳之恩。”“基督教的病毒或是仙丹已经进入我们西方人的血液——说不定它就是不可缺少的血液的别名。”[\[xxiii\]](#)基督教文明与西方宪政的孕育产生存在怎样的关联？阿克顿曾经指出：“一个基督徒由于他的信仰，不得不对人世的罪恶和黑暗敏感。这种敏感，他是无法避免的。基督教对人间罪恶的暴露可以说是空前的。我们因此才知道罪恶的根深蒂固，难以捉摸和到处潜伏。基督教的神示一方面是充满了慈爱和宽恕，另一方面也恶狠狠地晾出了人世的真相，基督教的福音使罪恶意识牢记于人心……他看到别人看不见的罪恶……原罪的理论使得基督徒对各种事情都在提防……随时准备发觉那无所不在的罪恶。”[\[xxiv\]](#)基督教通过对人性恶的揭示，使西方人对由人产生的权力可能导致罪恶的认识十分强烈。这种对于权力的态度和情感为西方法律制度及其宪政的产生奠定了文化的基础。近代西方宪政的诸多经典文本中，如《五月花盟约》、《独立宣言》等，大都赫然写着“上帝”、“造物主”，这决不是无缘无故的。

英国保守党议员安德鲁·泰利对美国在新保守主义思想指引下种种政策行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商榷：（1）美国没有那么强大，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2）全球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国家不多，强迫别人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是不现实的。（3）民主一定导致和平与繁荣是个值得争议的话题。[\[xxv\]](#)

第二项原则：现代国家政治分类应当立足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对现代国家政治类型的界定应当尊重这些国家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符合这类国家对自身价值观和行为特征的判断，不能用一种所研究国家不能接受的类型判断强加于这类国家。

乔治·凯南在分析西方民主的发源地与这类民主的推广之间的关系时发现：（西方）民主是一种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西北欧发展起来的政体，它形成于主要那些靠近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国家（但是也延伸到中

欧），然后这一政体又被带到世界上其它地方，包括北美的人，因为北美来自西北欧地区，要么作为最早的定居者，要么作为最早的殖民者。他们规定了文明政府的主导形式。民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基础都相对狭隘；当然，至于这种政体是否也是其狭隘的发源地之外的人民的天然统治形式，其证据还有待找出。没有理由认为，发展或运用民主制度的尝试是这些民族的最好方向。[\[xxvi\]](#)

国家政治分类问题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模式？各国权利立足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选择能够符合自身价值理念和现实需要的政治模式。“在历史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同，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也有差别，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民主制度也是有差别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可以这样断言：适应自己国情的，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就是好的，就是自己所需要的；脱离自己国情的，脱离实际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是不适用的。”[\[xxvii\]](#)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形成于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中，对中国国家类型的政治判断，不能用带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价值标准，并以此来衡量中国的政治发展，否定中国政治的当代性。与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不同，中国坚持人民主权的价值理念，积极创造一切条件调动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与西方政治多元的价值理念不同，中国共产党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认真倾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并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西方在政权结构内部凸现出分权制衡的价值理念不同，中国的政权结构是在内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开展有效率的协作，负责任为人民提供服务；与西方的宪政理念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内部权力制约和道德自律的传统，并且正在不断完善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的各种机制；与某些西方国家支持别国内部分裂与民族独立的价值理念不同，中国始终积极致力于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工作，并将其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和目标；与某些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对外扩张的价值理念不同，中国把独立自主地开展外交活动、维护国家主权、积极谋求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我国政府对外行为的基本准则。

[1] [美] 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与理论》，罗飞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2] [英] 罗德·黑格、马丁·哈罗普：《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张小劲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3]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娄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4]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娄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141页。

[5]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娄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105页。

[6] 2005年6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7] 《论语·颜渊》。

[8] 《论语·子路》。

[9] 《论语·宪问》。

- [10] 《论语·颜渊》。
- [11] 《论语·宪问》。
- [12] Tommy Koh, “The Strait Times”, Dec. 14, 1993.
- [13] 《荀子·致士》。
- [14] 《论语·宪问》。
- [15] 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
- [16] 《论语·里仁》。
- [17] 《论语·学而》。
- [18] 《论语·卫灵》。
- [19] 《论语·子张》。
- [20]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 [21]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董正华、咎涛、郑振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6页。
- [22]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董正华、咎涛、郑振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 [23] [英]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8-99、199-200页。
- [24] Lord Acton,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 the Beacon Presss, 1984, pp14~15.
- [25] 转引自丁一凡：《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 [26] George F. Kennan, *The Cloud of Danger*,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pp41~43.
- [27] 李铁映：《论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卷首语，2007年版。

本站所收集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和刊物所有，如果涉及版权问題，请联系我们。

[\[关闭窗口\]](#)